

# 乌鸦与白头鹎

黄开发

嘎——啊——，嘎，嘎……  
窗外传来熟悉的粗哑的啼叫，转头望去，见有鸟影从两栋宿舍楼之间掠过。我不禁会心一笑。前一大风，气温陡降，时令已交深秋。早餐时，我跟家人说，乌鸦们该回来了。果不其然。

傍晚，我去学校操场跑步。在绿色的草坪和赭红的跑道上方，伴着夕阳的余晖，几百只乌鸦上下纷飞，进进出出，大呼小叫，像是在为取得制空权而进行狂欢，令人顿时有置身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之感。

乌鸦是北师大冬季一景，每晚有几千只乌鸦在此过夜。北京常见的乌鸦有五种：大嘴乌鸦、小嘴乌鸦、秃鼻乌鸦、达乌里寒鸦和白颈鸦。来北师大过夜的属于小嘴乌鸦。小嘴乌鸦的个头要比大嘴乌鸦小一号，嘴形不像后者那样粗壮、嘴尖钩曲。乌鸦初到的几日，夜栖的树下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白色排泄物，像是淋上的石灰水。走近一看，除了白色外，还有草绿、褐色、红色等，简直五色斑斓。过不了几天，路面、路边像是被石灰水刷过一遍，夜晚在路灯的照射下，看似一层薄雪。进东门的一条主干道被称为“天使路”，是校园内乌鸦最为集中的区域。有句话说，未被“天使”砸，愧作师大人。又云，每个北师大人的头顶上，都有一只保佑的乌鸦。

从去年深秋乌鸦们入住，到今年一月中旬，我差不多与它们朝夕会面。傍晚时分，天光转暗，暮鸦成群结队，此起彼伏，从北边的觅食地飞回校园。它们在进入栖息地之前先进行集合，然后才进入栖息地。我家西边的小花园就是一个集合的处所，鸦群在比六层宿舍楼还高的毛白杨上起起落落，高谈阔论，小花园上空俨然成了巨型乌鸦会客厅。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它们才渐渐离去。晚上，我去办公室，穿过“天使路”、主楼与图书馆之间，可以见到乌鸦们挤满悬铃木的树枝，一动不动。偶遇大风，树枝随风摇动，不时有乌鸦掉

下来，它们抱怨一两声，又重新登枝。最喜欢在月明星稀之夜，城市安静了下来，月辉勾勒出寒枝上的鸦影，比夜色中所有的东西都更黑，仿佛黑色的精灵，有一种神秘的凄清之美。

北师大是京城乌鸦主要的聚集地之一，至于原因，说法不同。一种说法是北师大主校区一带过去是城北的大片坟地。在1950年代新校舍建设之初，还有一对镇墓的铁狮子，所以这一带又被称为铁狮子坟。乌鸦喜欢坟场，而它们又是有种族记忆的，所以每年都如期而至。另一种说法来自鸟类专家，他们解释道，城市热岛效应使乌鸦养成了夜宿城里的习惯，而北师大生态环境良好，师生们对动物友善，又有让乌鸦们感到安全的高大的毛白杨和悬铃木。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现在校园夜栖的是小嘴乌鸦，五十年前北京主要的鸦群属于秃鼻乌鸦，二者并非同种。

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我已在北京师大校园居住了二十多个年头，除了旅外的两三年，绝大多数的冬天都是在鸦叫声中度过的。一开始，对乌鸦是心存芥蒂的。与绝大多数国人一样，听到喜鹊叫就高兴，听到乌鸦叫则以为晦气。记得我六七岁时，邻居家的一老汉出门，不久返回，嘴里骂骂咧咧，自称倒霉。原来是遇到一只老鸦，迎头冲他“哇哇”叫了两声。他于是取消计划，择日再出行……人们总是相信，乌鸦与死亡有着神秘的关联，似乎对死亡有着特殊的嗅觉。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乌鸦是很正面的形象的。神话中说，太阳里住着三足的金乌，又称赤乌。因此人们把“金乌”或“赤乌”作为太阳的别名。古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历史传说，讲的是周将兴起之时，大赤乌衔谷种在王屋上麇集，武王与他的大夫们见后大喜。现实中也有乌鸦报喜之说，唐吴兢撰《乐府古题要解》“乌夜啼”条下就有这样的记载。大约从唐代以后，乌啼不吉利的观念才渐渐流行开

来。不过，满族等少数民族崇拜乌鸦，视乌鸦为神鸟和吉祥鸟。外国也有大量的类似事例，那是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乌鸦文化史的。

中国进入现代以后，人们接受了科学主义的观点，反映在文化中的乌鸦形象也大为改观。胡适在五四时期创作白话诗《老鸦》，其中写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1930年代初期，曹聚仁编文艺周刊《涛声》第21期封面印上了乌鸦图案：下面海涛汹涌，上面老鸦纷飞。同期刊登一篇《乌鸦商标上版记》，表明该刊对一切采取怀疑和批判的“乌鸦主义”的态度。

在刚刚过去的冬天里，校园里乌鸦的数量明显减少，而且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一月中旬，乌鸦突然悉数离去。以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过隔一天，顶多两三天，它们又会回来。这次直到二月中旬我到外地旅行，它们都没有露面。偶尔也见到小群的乌鸦从校园的上空高高飞过，但都没有降落。两个星期后回校，仍不见乌鸦们的踪影。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与校园环境的变化有关。“天使路”东半段两边种植泡桐，树冠都被截断过，上面已经不适合乌鸦们栖息了，它们集中停落在西半段悬铃木的树枝上。

听不到乌鸦的啼叫，我感到有些遗憾。然而，我新认识了一种在冬日里鸣唱的鸟儿。二月最后一天的下午，一家人去位于北郊的房子。进屋不久，就听到窗外有多只鸟儿在鸣叫，那声音婉转悠扬，比百灵更沉稳，又比画眉清亮。以前也听到过这种声音，但没有留意。我拿起一架单反下楼。循着声音，到了楼房西头一片由忍冬、刺玫和银杏等杂树形成的树丛。我看到唱歌的小鸟们了，一大群，或停或飞。它们比麻雀稍大，黑头，黑嘴巴，后枕有一块白色。几只喜鹊在附近飞来飞去，叫声喳喳，好像殷勤的主人；而麻雀们冷漠地蹲在

树枝上，缩着脖子，有一搭没一搭地闲叫。小鸟胆小而又机警，见我靠近，大多躲进树丛深处，有的停到银杏树的翼地逼近，小鸟们发出短促的嘎嘎声，纷纷撤离，落在几十米外一棵窄冠白杨高高的梢头。回来查资料，知道原来是白头鹎，雀形目鹎科，又叫白头翁。本是南方鸟类，近年来已在北方蔓延。其实我是见过它们的。去年冬天，小区的路上铺了一层厚雪，几只黑头带白毛的小鸟在平枝构子上跳跃，灌木的枝条上深紫的细叶已经落尽，挂上一串串比红豆还要小的鲜红的圆果。那美丽的画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白头鹎是冬天里的歌唱家。在寒冷的季节里，它们缘何而唱？鸟类网“白头鹎”条目下写道：“秋冬季节，白头鹎在进入繁殖期后会聚集在树林上喧叫，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群聚的现象，到春季时就消失了。”这记述与我的所见相符，看来它们是为了求爱而歌唱。

乌鸦们却一直都没有回来，校园里冷清了许多。记得去年乌鸦是三月初远行的。黄昏时分，我路过东西向的两栋宿舍楼之间，一轮圆月升到了东楼顶的上方。突然，呼啦啦一阵风起，前上方，上百只乌鸦从东向西飞来，呈弧线形斜越过东边一栋楼的瓦脊，再俯而下，落到高大白杨树上，不一会儿，同时起飞，哗啦啦地一大片，仿佛瓢泼大雨声。紧接着，又有一大群乌鸦沿着同样的弧线飞过，落下，然后飞走。精灵们行为反常，像是在举行一个神秘的飞行仪式。第二天晚上，乌鸦的数量就减少了一大半；再过一两天，校园里已经难觅踪影了。

今天秋冬时节，乌鸦们还会回到校园里来吗？多年来，早已习惯了鸦叫声，如果不来，寒冬里的校园会更让人感到冷清、寂寞。我乐于欣赏白头鹎、画眉、百灵歌唱，也希望听到乌鸦的啼叫。

在我国近现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翻译家同时又是作家。特定的时代赋予这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作家兼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大学德文专业撰写毕业论文时，在赵蓉恒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以“施尼茨勒作品中译考略及影响初探”为题，考察这位奥地利重要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流布，注意到这一现象。

在奥地利德语文学史上，出生于犹太医生家庭的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作为著名戏剧家、小说家，为他的祖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文学作品多以奥匈帝国都城维也纳为题材，被称为记录反映走向没落的哈布斯堡王朝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的编年史。作为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施尼茨勒的创作重在对他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人的心灵是个广阔的原野”成为他著名的格言。

当时，我整日在北京大学解放前报刊阅览室爬梳中国近现代德语文学翻译资料。在查找翻译施尼茨勒的中文资料时，我尤其注意到一位极其重要的译者赵伯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赵伯颜翻译了施尼茨勒三部重要戏剧：《循环舞》、《恋爱三昧》和《绿鹦鹉》，而且他是这些作品的第一位中译者。但赵伯颜的名字在今天很多的文学辞典、翻译家辞典中是找不到的，有关他生平事迹的专门资料更是几近于无。

作为一位罕为人知的翻译家、作家，赵伯颜的生平事迹今天只能从他写的《〈循环舞〉译序》(发表于1929年11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新文艺》第1卷第3号)和笔者收集到的一些偶然的零星资料中获知一鳞半爪。

首先，我们现在知道，赵伯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这是笔者在刘麟发表《新文学史料》上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一文中注意到的。刘文介绍了一份由侨居美国的顾一樵(即顾毓琇)先生珍藏的《会员录》。1981年，顾一樵把这份著录一百三十一人的珍贵文学史料赠送给作家冰心，后由冰心转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赵伯颜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录上，他是第七十三名会员，号“生佐”，籍贯为“四川江安”。

在《〈循环舞〉译序》中，赵伯颜提到他在维也纳留学期间曾亲自去施尼茨勒的寓所拜访过这位奥国文坛的宿将。兹摘录如下：

我在维也纳留学住过两三年，对于维也纳人的生活态度比较知道。我曾在1926年5月经维也纳大学戏剧学教授Caster先生的介绍亲自到天文台路七十一号去拜访过显尼志劳。显氏那时年六十二岁。据他说他的医学知识仍然没有忘记，家中人有什么伤风小病，他也亲自动手看看脉息，开开药方。他的为人很和蔼，他说东方人去拜访他的曾经有过日本人，中国人我还是第一个。五月十五日是他的生日，蒙他招我去吃茶，并且允许我把他的著作译成中文，在此一并感谢。

但查考近年出版的施尼茨勒篇幅浩繁的八卷本日记，在1926年5月15日笔者没有找到关于中国人赵伯颜来访的记录，而且这年是施尼茨勒六十四岁生日(不是赵伯颜所说的“六十二岁”)，当时施尼茨勒不在维也纳，而是在柏林。施尼茨勒日记像鲁迅先生的日记或吴宓的日记一样，记录得十分详细。每天的起居、来访的人物、阅读的作品他都一一记载下来。

为免刺激刚刚出院的奶奶，家人没把爷爷去世的消息即时告诉她，并一致达成共识：能瞒多久是多久。奶奶生病后说话有困难，但从她的眼神得知，她一直奇怪怎么爷爷不在屋里。爷爷丧礼那天，奶奶早上醒来突然大哭。我们知道，以奶奶的聪慧，她一定什么都明白，只是装作不知道。你们希望我好好的，我就不辜负孩子的一片好心。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眼泛泪光。梦到爷爷后我告诉爸爸，爸爸说：“你记得吗？爷爷离世前你正好在韩国出差，可能冥冥中有种感应，爷爷知道你想了他……”

都说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沿途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并不是所有离开的人都是过路人，有些人走了，但他仍活在你的心中。就算你对他的故事并不十分了解，就算你们的记忆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你还记得他爱过你，你还会时时想起他。

就像海桑那首《爷爷是个老头》中写道：打我记事开始，爷爷就是个老头他那么老，好像从来不曾年轻过他那么老，好像生来只为了做我的爷爷

我从未认真想过他有一天会死我总以为，一个人再老，总可以再活一年吧

然而有一天他还是死了就像土块的院墙风雨多了，总有一天会塌下来没了。

他的一生我也知道得很少他说过一些，我记不大起来就像他爱我很多，我只是喊他爷爷。

死亡总是措手不及地来临。爷爷走得很突然，突然得几乎毫无先兆。可他就是走了。

# 发现赵伯颜

吴晓樵

施尼茨勒为什么在日记里没有留下关于一个年轻中国人(而且也是一个作家)的来访，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赵伯颜曾计划在《新文艺》上写一篇关于施尼茨勒的访问记。可惜，由于他的突然病逝，此文最终没有作成。《新文艺》第一卷第四号《编辑的话》却给读者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我们这里特别要向读者报告的，就是答应给我们做《显尼志劳访问记》的赵伯颜先生，不幸在11月29日患伤寒在南京逝世。这不但是我们的厄运，也是全文坛的厄运。”

赵伯颜留学回国后，即直接从德文翻译施尼茨勒独幕剧《绿鹦鹉》，1928年八月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第25卷15号和16号连载)上，译文后附施尼茨勒小传。随后，他又翻译了施尼茨勒的两部名剧《恋爱三昧》(《循环舞》(今译《轮舞》))。《东方杂志》当时重视介绍施尼茨勒的戏剧小说。此前《东方杂志》在1925年曾刊登过袁昌英翻译的施尼茨勒剧本《生存的时间》(最后的假面孔)，后来又于1931年发表过钟宪民翻译的短篇小说《花》和施蛰存翻译的中篇小说《生之恋》(即名篇《古斯特少尉》)。

1929年，《绿鹦鹉》和《恋爱三昧》由上海乐群书店结集出版单行本。1930年5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循环舞》。这是整个二十世纪施尼茨勒戏剧在中国出版的第二个单行本。除了翻译施尼茨勒的戏剧之外，赵伯颜还和周伯涵合作翻译了德国著名剧作家豪普特曼的剧本《寂寞的人们》，1929年在上海文献书局出版。

经笔者多年的考察，赵伯颜同时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值得研究者重视的作家。只可惜我们的文学史家们至今还没有能够注意到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赵伯颜曾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创造月刊》等重要现代文学刊物上发表过文学作品。1921年6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刊载有他的《幸事》，署名“伯颜”。第二年七月，他在《晨报副刊》发表有《劳邻》，第二年十月发表有戏剧《朱江》，均署名“伯颜”。他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文艺创作四篇，其中小说三篇：《畸人》(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牛》(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1日)、《慧珍》(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戏剧一篇《沙锅》(第2卷第2期，1928年9月10日)。赵伯颜创作的中篇小说《畸人》有单行本问世，1928年8月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列入该社“文艺丛书”之第一种。苏雪林在《现代中国戏剧概观》(原载《青年界》1937年3月第11卷第3期)里曾提到了赵伯颜的《宋江》，认为同徐葆华的《妲己》、顾一樵的《岳飞及其他》等可以归入五四之后创作的历史“教训剧”一类。

作家、翻译家赵伯颜是否还有其他著作或译作传世，尚待发现。



可谓春光一片情 (国画) 柯桐枝

曾经我以为，道别可以去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毕业了去旅游一次，紧紧地拥抱彼此，再比如，狠狠地大吵一顿再也不相见，或者大哭一场然后不舍地说再见。后来我才知道，生命中很多道别都是悄然无声的，直到过了很久很久，才发现那天再普通不过的相见，竟然已是最后一面。比如，爷爷的离世。

爷爷去世后，我曾无数次想象，会在什么情况梦到他？梦里的他会和我说什么？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吗？我经常闭起眼想爷爷，然而，随着日子慢慢流逝，那清晰的轮廓逐渐模糊起来。今年一月，在韩国出差的最后一晚，我梦到爷爷了，我在梦里与爷爷通电话了。爷爷告诉我他很好，他在电话里笑得很开心，我能感受到他笑眯了眼。就仿佛他从不曾离开我们。

人家都叫爷爷“老黄”。爷爷年轻时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多，只晓得他以前是一名技术科长，在公司里带领着数百人的团队。爷爷和奶奶养大了五个子女，爷爷说：“要教育好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身教重于言教。”在家里和公司里爷爷都很受欢迎。

爷爷以前常常说：“短褂做不了长衫，做人要踏踏实实，学点真本领。”那是老一辈用自己的艰辛经历换来的感悟。

上海的炎夏闷热得很。很多年前，家用冷气机在上海还没普及，爸爸给爷爷奶奶装了冷气机，被爷爷狠狠地骂了一顿，甚至对爸爸说：“我要把冷气机扔出去。”气得爸爸说不出话来。后来邻居说，爷爷奶奶见人就：“我家的冷气机是我小儿子给我们买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老一辈人，爸爸和他的哥哥姐姐都是由奶奶带大，爷爷在

# 道别来不及说再见

黄芷渊

外上班，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退休后多家公司都想回聘他做顾问，但因为我的出生，爷爷婉拒了所有的回聘邀请，主动提出由他来照顾我。我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但婴孩时有一段时间在爷爷奶奶上海的家短住。听奶奶说，那时候爷爷每晚把我放在他床边，每隔四小时起床喂奶，而且他人生第一次换尿布就是帮我换呢！爸爸笑言：“连你爸爸都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

爷爷奶奶旧屋的门前有一棵大树，夏天下雨前，蜻蜓贴着树叶处低飞，夏蝉在树上鸣叫，盖过了鸟儿的歌声，诠释着夏日的酷热。我不够高，经常站在爷爷奶奶床上，趴在窗口看风景。大伯伯和小姑妈的家离爷爷奶奶家很近，有一次我独自溜出去找堂姐玩，爷爷找了我很久，急得涨红了脸。还有一次，我和表哥吵架，爷爷为了我把表哥骂了一顿，所以我一直认为，在我们这辈中，爷爷最宠我，噢，除了我妹妹。

爷爷唯一一次骂我，就是因为我和妹妹抢玩具，妹妹急了哭，爷爷对我说：“你是姐姐，就应该让着妹妹！”家里人叫我BB，叫妹妹茵茵，爷爷叫起来总叫“小BB”“大茵茵”，我问爷爷：“明明我比妹妹大，为什么要叫妹妹大茵茵？”爷爷总是笑而不语，后来

奶奶告诉我，可能因为妹妹小时候身体不好，爷爷叫她“大茵茵”希望她长高长大，健健康康。

长大后，我们每一次去爷爷奶奶家，爷爷都会下楼给我们买小时候爱吃的冰棍和酸奶，再后来，爷爷走路不便了，就叮嘱奶奶一定要给我们买，尽管那时候我已不太吃冰棍了。每一次离开爷爷奶奶家，他都会坚持送到门口，挥着手直到目送着我们的车离开。

还记得那天，我们一家去看望爷爷奶奶，妈妈给爷爷买了新棉袄，爷爷很高兴地穿起来。他坚持不肯收爸爸给他的零用钱，但收下了我和妹妹给他的1000元。爷爷眯着眼笑说：“噢！这要收的，这是我孙女给我的，好孩子！”爷爷去世后，家人为他收拾遗物时才发现，那1000元一直藏在棉袄的口袋里。没想到，那天的相见，竟然是我和爷爷的最后一次见面。

爷爷和奶奶的感情一直很好。尽管奶奶以前常说，在那个盲婚哑嫁的年代，她是被安排嫁给爷爷，但那么多年来，他俩都很相爱。

我喜欢逗爷爷奶奶玩，每次让他们拍照都会叫爷爷奶奶亲热一点：“爷爷，你要把手搭在奶奶肩膀上！”奶奶每次都会害羞地说：“不要，快把手挪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